

新中国故宫盗宝第一案

金册和宝刀不翼而飞

1959年8月16日清晨,下了几天雨的北京放晴了。管理员田义和早就起来了,拿着一大串钥匙,先把前门和后门打开,再把各展馆门打开,让清洁工们打扫庭院的卫生。

田义和迈着轻松的脚步走进了珍宝馆。珍宝馆是故宫的常设展馆,里面分为四个展室:皇极殿虎房、养心殿、乐寿堂和颐和轩,分别陈列着故宫所藏珍贵文物。田义和按照顺序,打开皇极殿虎房后就去开养心殿的门,还没上台阶,他突然感到有点儿不对劲儿,定睛一看:老天爷!养心殿第三扇门靠近地面的一块大玻璃碎了!昨夜虽有小雨,但是没一丝风,珍宝馆墙高门紧,连一只猫都进不来,玻璃不可能无故破碎。别问,准是贼进去了。田义和慌忙往保卫科方向跑去。保卫科马上报告了北京市公安局。

碎玻璃处显然是盗贼进出的路,侦察员在玻璃碴上提取到一小块儿贼留下的皮肉。养心殿有三大间展厅,分别陈列着珍宝,中间展厅四周陈列的金银器皿和珠宝玉器,展柜完好。被盗的是西间展厅的首卷柜,也就是“故编字1号”,里面陈列着14页金册、10页玉册、5柄玉雕花把金鞘匕首等文物。柜玻璃被打碎,陈列的14页金册中的8页和5柄玉雕花把金鞘匕首不翼而飞。侦察员在室内提取了细花纹鞋印和血迹,在柜上提取了掌纹和指纹。

此案非破不可

金册是什么?康熙皇帝生母早丧,他一直将顺治帝的皇后孝惠章视为母亲,这是为了尊奉她老人家徽号而专门打造的“证书”,纯黄金的,每页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北京警方有记载的故宫盗宝案一共发生了5起,分别是在1959年、1962年、1980年(两起)和1987年。本文选载的是1959年故宫盗宝案,被称为“新中国故宫盗宝第一案”。

长23.15厘米,宽9.8厘米,厚0.13厘米,重20两,上面铸有满、汉文字,四角各有一联结用的小金环。这种皇家金册,不仅材质为纯金,镌刻工艺精湛,由于是重大历史事件永难磨灭的记录,其文物档案的价值无法估量。完整的14页金册,居然丢失了8页,重达市制160两。

玉雕花把金鞘匕首是什么?刀把镶嵌有玉石,刀鞘包裹有黄金。选料上乘,工艺精湛,是顺治帝和乾隆帝使用过的珍品。

8页金册、5把宝刀被盗,在皇宫盗案史上也属罕见。中央首长下令,这起新中国北京发生的最大的盗窃案件非破不可!

北京市公安局紧急部署侦破工作,并成立了专案组,向全市通报了案情,全市安全保卫部门和基层群众组织都行动起来,进行反复调查摸底。

专案组的案情研究会上,大家讨论后初步认为,盗贼可能是8月15日晚翻墙进入养心殿院内,作案后离开的。但是,故宫壁垒森严,外有护城河,内有12米高的围墙,还有相当强的保卫队伍值守,那个贼是怎么进来的呢?

侦察员还分析,故宫内部工作人员监守自盗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是内部人员干的,完全可以不露声色地悄悄干,没必要搞那么大动静,打碎玻璃,又弄破了皮肉,还留下许多指纹足迹等。再说,在珍宝馆工作的人员都是经过严格审查完全可以放心的。

与此同时,北京市公安局报请公安部通报全国,要求各兄弟省市公安厅、局协助破案。

扒火车的两个农民

1959年11月11日下午,一列由上海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停靠在天津站内,按惯例,列车员逐一检查乘客车票。列车员发现,有两个农民装束的年轻人紧张地躲闪查票,于是将他俩拦住。

那个大一点儿的好像见过点儿世面,见了民警也害怕,但还不至于哆嗦。那个小一点儿吓得浑身颤抖着哭了。民警问那个大一点的,叫什么姓名?多大岁数了?从哪儿来?

“俺叫武庆辉,20岁,山东寿光县北洛公社北孙云子村的。他是俺本家弟弟,叫武良玉,一个村儿的。”

“你为什么不买票?”民警问。“身上没钱,扒火车来的。”武庆辉回答。“没钱?把兜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民警似乎不相信武庆辉的话。

武庆辉一听民警说让自己掏兜里的东西,紧张了一下,下意识地用手去捂自己的口袋。

民警站起来,走到武庆辉身边:“掏吧!”

武庆辉没办法,只好慢吞吞地掏出兜里的东西。

武庆辉脏兮兮的手把东西放在民警面前。黄灿灿,民警没见过,拿起来细看,倒吸了一口冷气:黄金!碎黄金,上边还有字!

第二天,北京市公安局接

到天津市公安局的电话,立即派刑侦技术科的技术员带着从珍宝馆提取的指纹足迹赶去天津,经过比对,珍宝馆文物被盗现场的指纹就是武庆辉留下的,碎金子也正是故宫被盗金册的残片。

天津市公安局的民警赶往山东寿光县北洛公社北孙云子村武庆辉的家。发现武庆辉住的耳房地面可疑,于是挖出来一个木箱子,打开一看,里面躺着5页金册和5把宝刀。

藏身厕所为盗宝

武庆辉在家是老小,因为父母双亡,备受哥哥姐姐的呵护,被哥哥姐姐惯坏了的武庆辉从心里不愿意干农活。于是,1959年7月的一天,他跑到北京找姐姐。姐姐嫁给一个军人,随丈夫住在北京永定门西河沿。

姐姐虽然心疼弟弟,但没有户口要想在北京找工作根本不可能。他看到姐姐生活也挺拮据。让弟弟出去玩儿,姐姐从不多给他钱,一次只给他五角,最多一次也就给他一元钱。

就是姐姐给他一元钱那次,他去了故宫。他拿着一元钱,先到了北海和景山公园,然后买票进了故宫。转了几个大殿后,他花一毛钱买了一张珍宝馆的门票,进去观看。

武庆辉家里穷,从没见过金银珍宝,这是第一次,而且那么多。看得武庆辉的眼睛直放光,心想:要是能把珍宝馆里的宝贝弄出来些,不就能换好多好多的钱了吗?

主意打好后,8月15日下午,他又向姐姐要了五毛钱,把姐姐家的一把钳子装进一个花书包里带上了出门。他看好了,珍宝馆那些宝贝就放在玻璃柜里,用钳子一砸,就能拿到手。他也想好了,那些大件的玉器不好拿,将来也不好卖,就拿拿金板和镶宝石的刀子,好往外带,将来也好卖。

下午4点左右,他进了珍宝馆的南门,仔细查看了地形,发现夹道里的一个公厕很不起眼,于是钻了进去。

武庆辉在厕所里提心吊胆地藏了三个多小时,等天渐渐黑下来,他听见工作人员都走了,才蹑手蹑脚地走出了厕所。他拿来几块木板,支在墙上,顺利上了墙头,跳进了养心殿的院里。踢碎了门上的一块玻璃后,赶快躲到东边的大柱子后边观察。

等了一会儿,没有任何动静,他从门下角的破洞里爬进了养心殿。因为着急,左脚踝被门框上残留的碎玻璃割下一块皮也没觉得疼。黑暗中,他摸到展柜前,用钳子砸碎玻璃,拿了8页金册和5把宝刀,装进包里,原路出了养心殿,又左转右转,居然走出了迷宫一样的故宫。

给了姐姐两页金册

天一黑,姐姐就开始着急起来,往日,弟弟这个时候早回来了。她抱着孩子到门口张望了好几回,也不见人影。夜里11点了,弟弟还不回来,姐姐只好睡下了。刚躺下,就听

见门外有响动,她赶忙去开门,弟弟钻了进来。

“姐,我上故宫了,这是从故宫里拿出来的。”武庆辉把包放在桌子上。

“我的天!你惹了大祸了!你就不怕给抓住?”姐姐的声音都变了调。

“北京这么大,哪儿就能找到这儿?”武庆辉嘟囔着。“这不是咱的东西!你还是给送回去。”姐姐说。

“我偷出来差点儿没摔死,你让我送回去,不摔死也得给抓住!”武庆辉说。

“不送回去也行,你快把它给我拿走!回老家去吧,北京不能呆了,以后别再来了!”姐姐赶快帮弟弟收拾东西。

“姐,你留两块。”武庆辉递给姐姐两页金册。

第二天,姐姐叫来丈夫,让丈夫送弟弟上了火车,回了老家。

盗贼被判无期徒刑

没钱的时候,武庆辉都不愿意在家乡当农民,有了钱,他更不甘心在家受苦受累了。两个月后,他认为风平浪静了,动员本家弟弟武良玉和自己一起到新疆去找工作。他想,躲到遥远的新疆,警察就找不到他了。

想到一旦去了新疆,就不能轻易回老家了,见北京的姐姐也不容易了,于是,他决定去新疆之前再去看看姐姐,顺便打听一下北京有什么动静。不想却在天津被抓住了。

1960年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庭宣判:武庆辉被判处有期徒刑。武庆辉的姐姐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而被武庆辉剪碎的那页金册再难复原,我们永远无法看到它了。

摘自《档案春秋》

前埃及驻华大使馆凶案侦破始末

深夜,匪徒入室抢劫

1950年9月3日晚11点钟,初秋的夜晚,凉风习习,前埃及驻华使馆里静悄悄的。此时早有预谋的3名匪徒戴着口罩,一高一矮,另一中等个、穿着灰衬衣的匪徒手持刀枪、手电筒及绳子翻入前埃及驻华使馆内,响声惊动了看门师傅(兼花工)黄启府,黄刚出屋察看,就被突如其来的3名匪徒捆了一个结实,口中塞进一团布。匪徒又急忙窜至使馆管事陈万钟卧室,高个子持枪威胁说:“你不要喊,我们是从台湾来的,是想向外国人借点路费返回台湾,快说!保险箱放在什么地方?”陈万钟回答不知道。3名匪徒无奈强行推拉着陈、黄二人来到女佣顾妈的卧室,惊恐的顾妈正要喊叫,已被布团塞住嘴,并被捆绑起来。3名匪徒随即分工,由矮个看守三名佣人,由高个和“灰衬衣”急速冲向楼上埃及驻华代办阿巴提的房间。

即将回国的阿巴提早已进入了梦乡。匪徒蹑手蹑脚推开门,直奔保险箱,高个子匪徒不慎被小板凳绊倒,阿巴提梦中被惊醒。见两匪徒气势汹汹直冲床前,阿巴提感到不妙,起身与匪徒搏斗,他们从楼上打到楼下。看管佣人的矮个子闻声后忙赶来行凶,用尖刀对着赤手空拳的阿巴提胸口猛刺数刀。惨叫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也惊醒了隔壁居室的阿巴提夫

南京刚解放时,美、英、法等近30个领事馆及人员还留在南京。前埃及驻华使馆就位于南京北平路(今北京西路)中段59号,独院洋楼,面积388.4平方米,为早年民国建筑。院子空地较大,环境幽雅。然而不久,在前埃及驻华使馆内发生了一起震惊国内外的抢劫案。顿时国际谣言四起,帝国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更是不遗余力地造谣中伤,说外侨在中国生命和财产得不到保障,甚至诬蔑“是中共的预谋”。为此,该案引起了中国高层领导的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对此批示,南京市市长柯庆施限定3天内破案。南京市公安局深夜接到报案后火速出动,一场特殊的战斗在古城南京打响……

人阿芙萝。阿芙萝也冲出卧室,拿起电话,但没有声音,显然是电话线被剪断了。阿芙萝呼喊声冲出房间,急忙替佣人们松绑,吩咐管事陈万钟立即报警,此时3名匪徒已夺路逃跑。

侦查,警方顺藤摸瓜

数分钟后,警笛长鸣,数辆警车停在使馆门前。首先是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同志赶到现场,封锁了使馆区域,迅速将已昏迷在血泊中的阿巴提送到鼓楼医院抢救,并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勘查。现场发现几处血迹,匪徒丢下的手电筒1只,白纽扣3枚,楼梯上发现匪徒遗留的用褐色新布制成的口罩1只,在匪徒越墙处发现有手掌血印,在墙外有土造枪1支。根据警犬追踪,在离墙100米处又发现一只同样的口罩,上面有血迹,在离墙200米处有一发子弹。又据佣人口述,同年3月,使馆曾开除了西厨张铭山,张曾扬言过要报复。为此,侦察员顺藤摸瓜,找到张铭山家。据悉,张9月3日确实未出门。根据初步调查情

况,市局、刑警队、分局对案情进行分析讨论,一致认为匪徒是乘三轮车逃走的,两只口罩做工粗糙,很有可能是一般裁缝制作,此案必有内线,对张铭山还是要暗中监视。侦察员们做了明确分工,决定再次深入调查。

命令,三天必须破案

1950年9月4日凌晨,市公安局副局长黄耕夫立即传达了市长柯庆施的3天必须破案的命令,大队长王忠及治安处长洪沛霖深感肩上的担子沉重。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对与使馆有关的人员展开全面调查。

当侦察员再次找到张铭山谈话时,张提供了一个重大线索:使馆雇工顾妈跟原使馆雇工吴其伟关系密切,吴1950年3月被解雇后,至今失业,吴时常到使馆来找顾妈。刑警立即对吴的住处监视并传其到派出所谈话,吴经过反复教育后如实陈述了在大使馆的所见所闻。吴称,9月3日白天他在大使馆门口等顾妈时,看到一个穿白绸褂的大个

子,在使馆门口绕来绕去,又不像找人的样子,曾有5次类似情况。刑警又再次向张铭山调查时,张提供了此人叫高遐昌,原系旧警察,国民党刑警外勤组长,解放后被留用,后因违纪被开除出公安队伍。市公安局决定立即拘捕高遐昌以及嫌疑人张铭山、张明亮、鄧治映。

突审,案犯胆战心惊

首先对高遐昌进行突击审讯。高遐昌知道此次被抓凶多吉少,但又不甘心交代罪行,带有试探性地将其过去当旧警的罪恶一股脑儿说了出来,并保证解放后从未干过坏事,愿以脑袋担保。王忠起身将桌子一拍,厉声喝道:“要你坦白是给你赎罪的机会,我们对你的罪行已全部掌握,隐瞒对抗必将严办!”高遐昌被严厉的训斥吓得胆战心惊,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低下头,如实作了交代:“南京解放前夕我未来得及随国民党逃走,心里后悔,多次想寻找机会跑到台湾去。1950年2月我巧遇老相识李善修,两人臭味相投,都

打算去不成台湾先到香港,但要弄到钱,跟共产党较量一下,先成立一个‘中国人民反共抗俄救国会’组织。两个人商议后,先后发展了成员20余人,印制了150张的反革命传单。为了筹集经费,以‘中国人民反共抗俄救国会’图章的函件,向美国驻华大使馆会计李鸿年勒索了20万元,又向山西西路新兴食品公司和申汇面粉号敲诈未遂。后来我提议,经费筹集太慢不如搞大的,一次成功。有一天,我们再次议论此事时,正好内弟张明亮在场,因其酗酒,前几天被埃及使馆开除,他怀恨在心,正想伺机报复。于是提供了阿巴提的卧室放有保险箱,内有黄金、美钞的信息。我们就开始密谋抢劫。”

根据高提供的线索,刑警队立即对张明亮的住处进行搜查,从张家中搜出一双带血迹的“回力”球鞋,血迹呈喷射状。随后将张明亮带到审讯室与高遐昌对质,高第一句话就垂头丧气地说:“我已全部交代了。”张明亮本想狡赖一番,但事到如今只好交代了犯罪

事实,陈述了提议抢劫的是张铭山,抢劫的主谋是高遐昌,抢劫是张明亮带着陈学荣和俞良坤干的。至此,“9·3”血案真相大白。

告破,埃及表示感谢

刑警队乘胜追击,陆续将“9·3”罪犯全部抓获,一举破获了这个有计划、有组织的现行反革命组织。其犯罪团伙人数众多、组织严密、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影响之大,堪称解放初大案之最。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批准,法庭正式宣判:判决抢劫主谋、策划者、匪首高遐昌、李善修、张明亮3人死刑,于1950年12月2日绑赴水西门外江东路省心堂义冢刑场执行枪决。从犯张铭山及现场抢劫犯陈学荣等13人分别被判处5年至15年有期徒刑。在外地的所有该反革命组织成员被当地公安机关逮捕法办。至此这起特大抢劫案宣告结束。

已在鼓楼医院康复的阿巴提对前来看望的市公安局治安处长洪沛霖说:“贵国政府和警方如此重视,及时破案,并承蒙非常之关照,我与夫人心中万分感激,我一定把贵国的友好情意向总理大臣电告。”果然,阿巴提出院后,立即将整个案情向埃及国王作了汇报。不久,埃及总理大臣在联合国辩论会上,投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赞成票,对其他国家认同新中国产生了一定影响。

程堂发(选自《世纪风采》)